

重新定位周金波

——迎中文版《周金波集》的意義

◎羊子喬

鄉的追憶與對現實的熱情；後者收錄他與呂泉生合作所寫的歌詞，並附有樂譜。《評論卷》中收錄他人對王氏作品的批評，可作研究參考之用。《書信及日記卷》記錄他的日常寫照與生活態度，有助於讀者對其內心世界與生命情境的理解。此外，在《隨筆、翻譯卷》收錄的眾多語條，可以看出王氏孜孜於「作家之道」的學習歷程。創作之外，《影像卷》的資料亦提供了另一種「閱讀」王昶雄的方式，藉由一幅幅的舊照瀏覽，讀者可以穿越時間長廊去挖掘作者的生命軌跡。

此次《王昶雄全集》的出版，內容上涵蓋了王氏生平所有出土的著作與論述（包括一冊影像集），不但可以窺探到作者廣袤的文學視野與思想內涵，也可看到王氏如何以文學具體實踐他所秉持的「為人生而藝術」的信條。對於從事台灣文學及其相關領域的工作者而言，此全集的出版無疑也提供了研究方面重要的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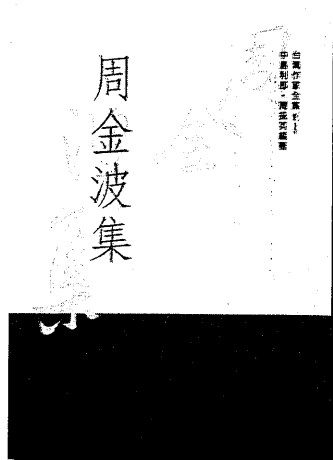


圖96 日治時期作家周金波作品的中譯與出版，提供後學者更進一步了解殖民地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在國家認同上矛盾與衝突的背景。（許玉蘋 攝）

由日本岐阜聖德學園大學教授中島利郎、周金波之子周振英編著的《周金波集》，由前衛出版社於2002年10月出版，列為台灣作家全集別集。

周金波以處女作小說〈水癌〉飲譽1941年的台灣文壇，又於同年9月份的《文藝台灣》發表小說〈志願兵〉，榮獲「文藝台灣賞」，於1943年8月代表台灣作家，到東京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對於《周金波集》的出版，與周振英合編的中島利郎表示，從周金波與張文環等同時代人往返的書信可以窺見，當時根本沒有「皇民作家」的存在，研究學者如果不閱讀日文原文，而只憑藉著翻譯過

來的理解，常常會發生謬誤論斷，是非常不公允的。

日本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也指出，「皇民文學」確實是研究台灣文學很「危險」的一環，他主張要回歸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去理解作家處境，可以說「1938年8月14日進入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到1945年8月15日之間，都是『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文學』。」

下村作次郎同時也表示，當時不只周金波寫〈志願兵〉，日本人也寫，而他比較了其間的差異，指出日本人寫志願兵全無遲疑，台灣人寫志願兵，卻透露出認同的苦惱。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員河原功認為，討論戰時文學必須體認到「非常時期」的處境，而不能僅以「皇民作家」來扭曲，不但應回歸原文文本，還應以更正確更自由地從各種角度來研究，以還原時代的精神。

周振英表示，台灣的文壇耆老葉石濤曾在《台灣文學史綱》一書中，指出周金波為「皇民作家」，但後來又說「沒有皇民文學，都是抗議文學」；因此，周振英希望廣大讀者能夠藉閱讀文本，重新檢視周金波的文學座標，讓過去不公允的評價，回歸歷史原貌。

周振英又說，其實周金波之所以對於外界長時間的誤解不願意說明，原因除

了受日本教育影響外，其實他自有一套對於「台灣文學」的看法與寫作的責任。周振英認為，父親周金波就是要大膽而率直地、周到地，把成長的台灣生命表現出來，不管台灣是保守的、媚態的、躊躇的、懷疑的、還是躍進的，因此並不在意被標籤化和污名化。《周金波集》中文版的出版，不僅可以探討周金波的文學思想，並有助於台灣人以開放、自信的態度，重新釐清「皇民文學」、「皇民化時期的文學」的特質，與這段日治歷史的吉光片羽。

《周金波集》出版了，對於刻不容緩日治時期皇民文學的釐清，應該會有極重要的參考作用。由於皇民時期的文學也反映了當時台灣人的生活情景，也傳達部份自東京返台灣知識份子的心態；畢竟這些文學作品曾經存在過，也產生了影響力。對於這段不算光榮的歷史，我們應當還給他們一些公道，而不能站在中國本位、大漢民族的立場來苛責這些作品，而應以台灣人的觀點，重新給予定位。

我們深信對日本在台作家和皇民文學的再釐清，有助於未來台灣文學史家，面對1949年至今的所謂「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定位時，不致於倉皇失措。如今，《周金波集》的出版，也提供了台灣文學研究者研討周金波的文學思想，了解所謂「皇民化時期文學」的重要史料。